

奧斯威辛集中營秘聞

译者前言

1944年年初，希特勒分子已经意识到他们的末日来临。在西部，尤其是在法国，渴望自由的人民加紧了对入侵部队的包围，包围圈一天天缩小；在东部，苏联军队以压倒的优势迫使侵略者节节败退，德军似乎已经丧失了还击的能力。与此同时，同盟国空军也在德国的心脏地区摧毁了纳粹分子的武库，破坏了它赖以补充给养和武器的大本营。

纳粹分子象一个被追捕而走投无路的强盗，狗急跳墙，以惨绝人寰的暴行来弥补战场上的败绩，致使几百万欧洲的无辜居民惨死在罪恶的焚尸炉中。

1944年3月14日到15日的夜晚，德军占领了匈牙利，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按照几年前拟定的血腥计划——就是禁止这个国家的犹太人离开家园。这个计划在占领后的第二天早上以前就全部完成了，从而在其后很短的时间内就集中和关

押了全国各个地区的犹太人，接着又秘密地把他们运往死亡之地。

尼斯利大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同他的犹太同胞一道被押送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

本书对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描写是绝对真实的，尼斯利大夫所记述的某些事实在众多集中营的史料被披露15年以后仍然不为人们所详知。实际上，为了灭口，为了最终掩盖他们的罪行，德军司令部即使对于在集中营工作过的纳粹士兵也下令一律就地清除。——没有人能够从集中营里活着出来，尼斯利大夫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创造了奇迹，他也许是整个集中营中唯一幸免于难的生还者。

集中营党卫队的主任医生门格尔博士指定尼斯利大夫为焚尸场特工队的法医和解剖医生。这支特工队的工作场所是在一个与世完全隔绝的几道铁丝网围墙里面，这里是一个罪恶的核心，就连党卫队的士兵也不得涉足其间。

尼斯利大夫就在这样的“核心”里留了8个月，当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从集中营里逃脱出来以后，如实地为我们写下了他的亲身经历和见闻。

我们把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展览当年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的罪行，其主要目的是和大家一道温习这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历

史，牢牢记住罪恶的战争曾经给和平的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1986年12月10日于合肥

作者宣言

本人，米克洛什·尼斯利，医学博士，原奥斯威辛集中营的A·8450号犯人，声明撰写这部著作。

奥斯威辛集中营焚尸场的高炉吞没了千百万男人、女人和儿童，本人以焚尸场内工作人员和见证人的身份，遵照严格的事 实，不带任何偏见，没有丝毫夸张，在该书里如实地记载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这段岁月。

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焚尸场的主治医生，我拟写了无数的解剖记录和法医鉴定书，并签上了刺在我身上的代号。我的上司门格尔博士在这些资料上签字以后，我把它们邮寄到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机构之一的“柏林·达伦人类学研究院”，这些资料今天应该仍然被收藏在该研究院的档案里。

在撰写该书的时候，我并不期望取得文学上的成就，当我在经受这些超乎任何想象的恐怖

时，我并不是作家，而是一个医生。

今天，我把它写出来，其用意并不在于成就一篇报道，而是要通过我让世人更加详尽地了解集中营。

1946年于奥拉迪亚

1

初夏5月，90个人象沙丁鱼一样挤在一节用于装运牲口的铁皮车箱里，窄窄的车窗上钉焊着锯齿形铁栅栏。每个人身上渗出的气味和不断外溢的马桶里散发出来的恶臭互相混杂，致使车箱内的空气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

这是一列装载犹太人的火车。4天以来，40节同样的车箱不停地滚动着。列车首先经过了斯洛伐克，把我们带向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们是第一批大约100万匈牙利犹太人，厄运已经降临到我们每个人的头上。

穿过塔特拉山脉，我们到达卢布林和克拉科夫的车站。这两座城市是战争期间的集中营——更确切地说，是杀人场，因为它们聚集了欧洲所有反纳粹的无辜公民。德国人把他们赶到这些地方是为了更方便地消灭他们。

从克拉科夫出发，我们的列车又行驶了将近1个小时，然后停靠在一个规模很大的车站里。哥特体的“奥斯威辛”写在一块牌子上，我们才第一次知道了这个地名。然而这对于我们毫无意

义，因为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地方。

从车箱的裂缝里往外望，我发觉我们列车的周围热闹非凡。一直押送我们的党卫队员被另外一批人换了下来。铁路员工们离开了火车。从偶然听到的只言片语中，我意识到我们差不多快要到达最后一站了。

火车重新开动，大约20分钟以后，在一阵长鸣声中停了下来。

这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和西里西亚东部的荒原差不多，到处可以看到一些绿色的灌木丛。远处，间隔均匀地竖立着一根根钢筋混凝土桩子，它们之间从地面一直到顶部一例都蒙上了蒺藜铁丝网并且延伸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铁丝网上挂着的牌子警告人们它们是通有高压电的，过于接近它们对谁都不可能是一个好兆头。铁丝网还在这块土地上划出许多很大的方块，每个方块里面，几百幢绿色油毡纸盖顶的平房组成了一条条平行笔直的甬道。

在营房区内，我看到一些穿着苦役犯的那种条子囚服的人。他们有的在搬运木料，有的扛着铁锹和镐头，稍远一点，一帮人正在把沉重的木箱装到汽车上。

沿着围墙，每隔三四十米，就有一幢很高的房子，那是瞭望楼。每幢楼里都有一名党卫队士兵仄身倚靠在一挺支架着的机枪上。

这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

所有这一切都是不祥之兆，但在眼下，我们的好奇心到底要比所有恐惧的心理更强烈些。

我们的车厢里有26位医生，6个药剂师，6名妇女，还有小孩和几位老人，他们都是我的同伴们的亲属。这时候，他们有的坐在行李上，有的坐在地板上。我看了看我的这些伙伴们，在他们的疲倦而麻木的脸上，新来乍到的冲动也未能掩饰住某种难以名状的预感。小孩子有的睡着了，有的在吃着仅剩下的一点东西，还有几个因一无所有，试图用干燥的舌头湿润一下开裂的嘴唇。

沉重的脚步在沙地上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嘹亮的口令声打破了等待中的寂静。当车门慢慢打开的时候，声嘶力竭的命令声同时挤进车厢：“统统下来！手提包带上，行李一律留在车上！”

男人们首先跳下车，然后，我们把夫人和孩子从离地面1米50公分高的车上抱下来。在卫兵们的指挥下，我们沿着铁路线一字形排开。一位年轻的党卫队军官站在我们面前，——此人穿着乌亮的长统靴，腰身紧束的军服领上别着一枚玫瑰花形的徽章。我搞不清别动队的军衔，但从这位年轻军官的袖章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医生。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这里党卫队的头儿，奥斯威辛

集中营的主任医师门格尔博士，一个货真价实的杀人不眨眼的魔鬼。

在这里，我们首先必须接受挑选和分类，就象讲究的厨师必须把精肉和肥肉在烹调前那样细心地分开一样。

开始时，别动队的士兵们匆匆地把男人和女人分开，14岁以下的孩子则可以跟随他们的母亲。车箱里混在一起的这帮人立即被撕裂成两堆，我们的心一下子紧缩了！士兵们在回答我们的问话时总是那样和蔼，就连语句的选择和口气也全部都是幼儿园里的阿姨哄小孩的味道：没关系，把他们带去洗个澡，洗澡是多么快活的事情！当然，到了一个新地方，消毒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惯例，不要多大一会儿，你们各家仍会安然团聚的。

在大约5000人有秩序地来来往往的这段时间里，我观察了一下我的周围。从车箱里看到的景物此时在落日的余晖里形成了一个朦胧的立体轮廓。一座高耸的红砖砌成的方形烟囱遗世独立，在烟囱顶部，4根避雷针构成了一个奇怪的四边形，在那四边形的对角线相交处，灼亮的火球组成了一串串不断抖动上升着的大链条。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来到的不是别的地方，正是举世闻名的焚尸炉之国——德国。

我在德国生活了10年，首先是求学，接着便

是行医，我知道，在德国，任何一个最小的城市也一定得拥有焚尸炉。

这幢房子就是焚尸场。稍远一点的地方，我看到了第二幢带着同样烟囱的房子。在一片稀疏而偏僻的树林里，我发现了第三幢相同规格的房屋，它的烟囱里冒着同样骇人的火焰。一阵微风过后，我立即嗅到了一股烧焦了的肉体和头发那种令人恶心的气味，直冲脑门。正当我的思绪向着纵深延伸的时候，第二阶段的挑选开始了。男人、女人、小孩、老人必须排成一路纵队，然后从“挑选委员会”的魔鬼们面前走过。

随着门格尔博士的手势，人们又被重新排成两组。左边那一排是老人、残疾人、体弱者、病人及带着不满14岁孩子的妇女；右边的那一排则由男人和能够从事体力劳动的强壮妇女组成。就在这右一排里，我发现了我的夫人和我那14岁的女儿。我们离得很近，但却不可能交谈，这其实没有什么，我们彼此都用目光示意着。

不能行走的病人、老人和神经错乱者被装在一辆红十字会的车上，站在我身边的几位老年医生也请求上车，车子开走了。接着，左边的那一排人变成五列纵队在党卫队的士兵的押送下也相继离去，几分钟以后，他们消失在不远处的一片树丛里。

右边的人们留在原地不动。这时，门格尔博

士命令医生们走出队列；接着，他走近由50多名医生组成的新队列前面，要求在德国的某一所大学里读过书、懂得病理解剖学并且当过法医的人自动报名。“请注意，”他说道，“一定要内行才行！否则……”他做了一个极其意味深长的手势。

我看了看我的同行们，他们似乎都多少有点儿无动于衷。或许他们中间真的没有这方面的专家，要么就是他们早已被吓晕了头，管它呢！反正我的主意已定。——既然我们压根儿就没有交上好运，那么，在坏运气中间其实是并不存在选择的，我走出了队伍。

等待我的是一连串严厉的审问：在什么地方就学，教授我的病理解剖学的教授叫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学的法医知识，进行了多长时间的实践，等等，等等。

我的回答大概是令人满意的，因为他们马上把我从其他几位同事中分离出来，并命令他们回到原来的队伍中去。他们松了一口气。我这样说是我当时对事态的发展一无所知，比如左边那排人和被车子装走的那些人，只在几分钟之后就进入了其中一座焚尸场的大门。

2

独自一人站立在队伍之外，我思索着我的命运，思索着德国，杂乱无章地回忆着在那里度过的年轻时代最美好的时光。

在我的头顶上，天空布满了星斗。我看到了大熊星座，它跟我在匈牙利看到的没有什么两样。习习的晚风不经意地吹拂着，如果其间并不夹带着第三帝国的焚尸场焚烧尸体的气味，它也许将是特别怡人的。

分布在各个铁丝网柱子顶端的几百支弧光灯亮了，发射出十分耀眼的光芒。在这些夺目的光束之外，天色却越发变得死灰，象一层厚厚的雾翳笼罩着整个集中营，只有那些远远近近的树丛的影子还依稀可辨。

火车上早已空无一人。几个监犯正在匆匆忙忙地把车箱里的皮箱、行李等物品搬下来，然后又装到停靠在旁边的汽车上。暮色更深了，40节车箱越变越模糊，终于连附近的物体也分辨不清了。

门格尔博士向党卫队的士兵作了最后一番交

待以后，便走近他的汽车，他坐进驾驶室，然后示意我也可以上车。我坐在车子的最后一排座位上，旁边一位党卫队的士官正襟危坐，他连正眼也没有看我一下。

汽车开动了。

我们颠簸在集中营里被雨水冲得凹凸不平的公路上，路旁刺眼的弧光灯纷纷向后退去。一会儿，汽车在一扇铁皮门前停下来，一位站在岗亭里的党卫队士官跑过来开门放行，于是我们的汽车又继续在两旁栽满了树木的干道上行驶了几百米，最后在一幢样子比较考究的房子前面停下来。

门格尔博士走下车，我也跟随着下来。门口挂着的一块牌子告诉我到了什么地方，我们走进了“集中营办公室”。几个穿条子服的人正坐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他们呼啦一下同时离开各自的座位，立正站着。门格尔博士打了个手势，一位50多岁的秃顶犯人立即跑到他的面前。我站在他们后面的几米处，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桑格勒大夫，第六营房的医生——我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点头应诺着。他把我领到一位犯人的办公室里，这个充当文书的犯人找出几份表格，他询问了我的身份并记录在一本簿子上，然后把填好的表格递给一位党卫队士兵。

我们离开了办公室，经过门格尔博士面前

时，我轻轻地弓了弓身子。桑格勒大夫对于我的举止表示出明显的不以为然，他用那种抑止不住的与其说是恶意不如说是嘲讽的口气正告我，这里是集中营，压根儿就不需要这一套，社会上的一切礼仪在集中营里都是多余的。

一位士兵把我领到第三幢平房里，平房的入口处挂着一块“消毒浴室”的牌子。我和我的表格同时被一道交给了另一位党卫队士兵。一位犯人走过来取下我的药箱，在我的身上搜了一遍以后叫我把衣服脱光。理发师用电剪在我的身上和头上都认真地推了一遍，包括汗毛和阴毛，然后把我带到淋浴间。他们用氯化钙溶液给我洗头，我的眼睛被刺激得疼痛难忍，过了好几分钟才可以勉强睁开。在另外一个房间里，我换上了一件差不多全新的上衣和一条条子裤，我的皮鞋被放在装有氯化钙溶液的池里浸泡后也还给了我。我试了一下衣服，可体合身，鬼知道是哪一位倒霉的伙伴留给我的。

一位犯人卷起我的左袖，看了看我表上的号码，然后，拿起一支笔，用笔尖在我的胳膊上刺了许多小点儿。这些小点儿随即显出模糊的蓝色印记。他告诉我，皮肤可能会轻度发炎，但这不要紧，一个星期以后症状就会消失，留下的只是更加清晰可见的号码而已。

我被刺上了号码，至此，那个米克洛什·尼

斯利大夫已不复存在，他是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一名犯人，代号是：A8450。

3

就目前而言，我的处境并不坏，甚至还算十分美妙。门格尔博士期望我从事一项神秘的医学研究。我可能被用来接替一位被调往德国某地去从事法医研究的同行。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这种希望也许不是玫瑰色的，但它也肯定不是灰色。根据门格尔博士的指示，人们没有给我穿那种犯人的衣服，而是给我一套很象样的便服，穿上这套便服未必能有绅士风度，然而对于一个医生却是非常适宜的。

子夜已过，但我毫无睡意，我细心地倾听着营房头目的每一句话。他了解集中营的全部情况，说得出集中营党卫队头头脑脑以及负有重要职责的全部监犯们的名字。从他那里，我得知奥斯威辛集中营不是一所苦役营房，而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最大的一座杀入场。他还向我介绍了每周一次在各所医院和各幢营房里进行挑选的情况，人们把数百名犯人装上汽车，然后便径直把他们引

进焚尸场内。

从他的嘴里，我熟悉了各幢营房里犯人们的生活：800至1000名犯人挤在一幢营房里，由于过分拥挤，他们无法平躺，只能横七竖八地倒在下面，一些人的脚必须放在另一些人的头上，有时候，人们则又可能在自己的颈上或胸口上同时摸到好几只并不属于同一个人的手、胳膊、脚或者小腿。

这里没有什么人类尊严可言。这些不幸的人们往往为了争得一点点安身入睡的空隙而互相推挤，互相谩骂，当然也少不了拳脚相见，大打出手。

他们的睡眠只能持续到凌晨3点。这时，手持橡皮棒的狱卒把他们一个个赶起来，他们互相推搡，猪似地拥出营房大门，并且十分迅速地排成队。

正是在这种时刻，集中营里最没有人道的一个节目，即“点名”开始了。

犯人们排成五列横队，接着开始“整理”队伍，首先，营房的文书命令大个子排在第一行，把小个子排在最后一行。犯人们刚刚站好，就走过来一个狱吏，即值白日班的监守，他挥着拳头把高个子赶到后排，而把小个子拉到前排。最后，又走出一位营房头目，此人穿得标致，吃得也饱，精神十分旺盛。尽管他也穿着犯人的衣